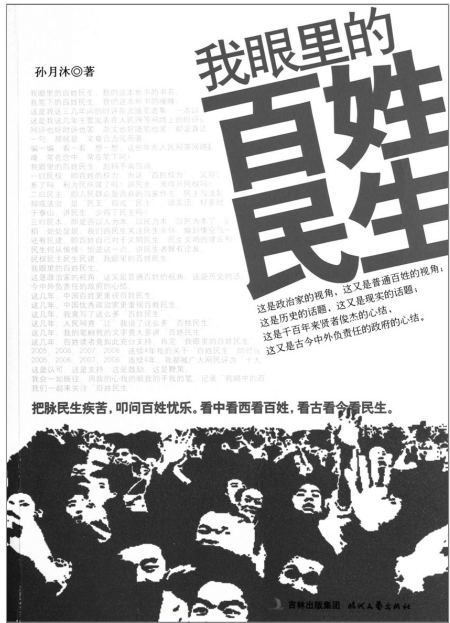


▼ 三昧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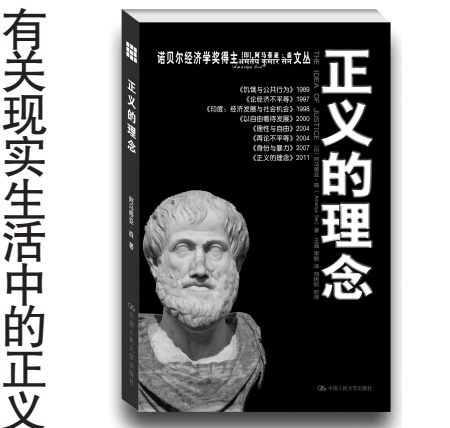
在中国当前的国情和语境中,若想成为合格且能有所成就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具备几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积累;其一,历史文化,包括中国的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其二,经济学;其三,法学;其四,自然科学;其五,道德哲学。以此眼光审视媒体人、时评家孙月沐的这本《我眼里的百姓民生》,相信多数人会同意,孙月沐基本配得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坚持戴着镣铐跳舞,往往是这类有追求有坚守的中国媒体人、时评

▼ 书者话书

未来的人类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迁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到了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这项运动涵盖的移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多达二三十亿,约是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几乎所有人都难免受到影响。不论就规模或范围而言,这项迁徙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后无来者;实际上,家庭生活因此产生的变迁——不论是农村的大家庭还是城市的小家庭——将就此终结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核心发展:亦即人口的持续增长。

上一次人类出现如此剧烈的迁徙潮,地点是在欧洲与新大陆,时间介于18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结果直接造成了人类的思想、治理、科技与福利彻底地改头换面。大规模的城市化造就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且随之带来前两个世纪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尽管如此,这种人类变迁的观点却从未不曾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的报纸或是20世纪初的国会辩论中。人口涌向城市以及过渡性都市飞速地出现,对许多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但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发展;而城市化走偏了方向所造成的灾难——包括各种苦难、革命与战争——经常正是这种盲目导致的直接后果;我们的思考未能虑及这种大量人口涌入的情形,结果新近人口因此陷入困境、遭到排挤、心怀愤恨。这个时代的历史有一大部分都是从失根之人造就而成。他们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于是采取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

▼ 关 注



阿马蒂亚·森曾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新作《正义的理念》问世以来,在西方世界再度掀起有关正义及我们为什么需要正义的讨论。阿马蒂亚·森认为,我们需要超越,而不只是停留在对于不公正的直观感受上;我们必须通过理智的思审,来对日常感受到的不公正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确定我们目睹的悲剧是否可以成为谴责的依据,才能将不可抗拒的灾害与本可预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祸区分开来,才能将我们的视野由对惨状的单纯观察和施救,转向对不公正现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

森还明确指出,研究正义问题,需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的探讨上;需要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而不是局限于寻找绝对的公正;我们的视野可以遍布全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的边界范围之内。任何人都都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把正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贴上西方世界的标签。森的突出贡献表现在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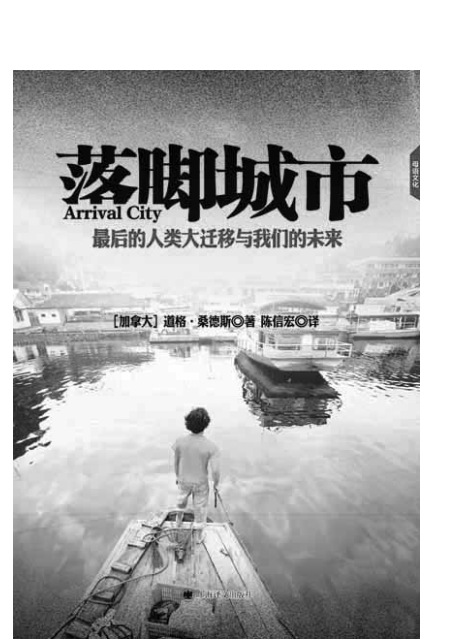
《《正义的理念》,(印度)阿马蒂亚·森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家的选择。他们在言论的舞台上,与社会乱象、资本、权力抗争留下的镜像,令人崇敬,亦生省思。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成功的欣喜,亦有“无所适从”的迷惘和阵痛。基于此,本书涉及的话题不离四端:“官察——民安”即民权,“法治——民主”即民主,“民本——民生”即民生,“民享——民建”即民建。在这“四端”视野的观照之下,孙月沐的笔墨重在细部勾连,由此便产生了“旁观者清,远观以达”的效果,继而引申出对于中国社会和民生发展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当然,在如履薄冰的民生改革进程中,“把脉民生疾苦,叩问百姓忧乐”,其旁观、后顾的意义并不低于前瞻。

“这个世界会好吗?”据说,国学大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曾亲口问过梁漱溟。“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今天看来,梁漱溟当时的回答类似欧洲趋势大师马蒂亚斯·霍尔茨的乐观主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未来,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世界每天都为我们带来了一点点小奖赏。”但与众多海内外学者对世界或对百姓民生的“乐观”态度相反,孙月沐的“百姓民生观察”显然渗透着一种深刻的怀疑:“权在官之手中,权为民所谋了吗?相应的,情为民所系了吗,利为民所谋了吗?”“民生何从依傍?”

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



我们今天如果犯下同样的错误,认为这种人口的大迁徙无关紧要,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杂音,或是其他人面临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无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遭遇更严重的暴乱和冲突。这项大迁徙的若干影响早已出现在我们面前:外来移民在美国、欧洲与澳洲引起的社会紧张;伊朗、委内瑞拉、孟买、阿姆斯特丹与巴黎市郊出现的政治冲突。不过,许多变化与断层都完全没有受到注意。我们不理解这种迁徙现象,原因

▼ 尚书坊

聆听中国文化里的魂魄密码

□王溢嘉

中国人的灵魂交响乐

每个民族或文化都各有其灵魂观,阐释对生命本质、人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终极存在等诸般问题的看法。要了解中国人的灵魂观,以及它和别民族或文化的异同,方法和途径其实很多,明清笔记小说里的魂魄传奇可以作为切入点及解读样本。

在明清笔记小说的各种怪力乱神的故事里,有关鬼、僵尸、地狱、坟场、附身、转世等魂魄传奇无疑是最多样也最骇人耳目的一类。“料厌仄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过去有很多人认为这些魂魄传奇其实是“另类文学”,旨在“讽喻”现实人生。其实它们更原始也更重要的目的是以故事的方式来传递有关灵魂信仰的讯息,这些故事更像是中国人的“灵魂交响乐”,是了解中国人灵魂观的极佳材料,一方面因为它们都来自民间,一方面也因为它们很适合做“心灵考古”,我们既可回顾过去,到更古老的诸子百家思想里去寻找观念源头,又可立足当代,和今天华人社会里相关的现象进行比较,对中国人灵魂观的“来龙去脉”有较完整的掌握。

但面对这样的“灵魂交响乐”,若想“聆听”出一些名堂,我们需要有跟以前不一样的耳朵和方法。用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évi-Strauss)的“神话交响乐”来作比喻的话,这些魂魄传奇的作者诸君并非“作曲者”,而只是“演奏者”,他们演奏用的“乐谱”乃是来自民间,演奏者只是使它们听起来更赏心悦耳或更惊心而已。因此,我更着重的是故事的乐谱性,而非文学性。对“秋坟鬼唱诗”的聆听,不是欣赏其在“美学”上的诗意,而是想知道它们在“灵魂学”里占有什么位置。挑选的88个故事都各有特色,但只有将它们合而观之,才能浏览到中国人灵

当然,《我眼里的百姓民生》中很多文章是从政府出台的重要文件开始谈起,表达忧思,给予建议,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契入了冷静的批判——时间证明,他是对的。住房、就业、教育、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保障、文化民生……有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它们在时间的绵延中缓慢聚集更多的疑问,绑架人的自信,使人变得更加谦卑、更加宽恕。有些问题,本可以给出明晰的答案,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些答案被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孙月沐谈论和评论的问题,属于后者。他不惮于给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解答,尽管,他并不自信自己的解答能否鼓励那些本该直直走向问题的人们。人们或许能想象出这个坚毅慧敏、两鬓微白的男人,眼神深邃而略带清幽的“迷茫”。谁都不自信,能以一己之力,奔跑着将人们带到问题的内核;谁都不自信,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但是,我们都没有权力忧伤,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是理性,而且是建立在高度共识之上的集体理性。

以“表达权”为例,孙月沐认为,将群众的意见、建议、呼声,要求中的合理的、有用的哪怕是刺耳的、让人面红耳热的怪话、抱怨话、牢骚话甚至骂娘话——只要是合理的、有用的话,都来一个“洗耳恭听”,来一个“兼听则明”,来一个“择善而从之”。这才叫“打开眼路”,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否则,或者会出现万马齐喑,大家都闭上嘴“不表达”;或者会出现祥林嫂那样啰里啰唆说话没人去听的“伪表达”。不管哪一种,都是与“听取表达”背道而驰的。本是常识,却又为何需要加以重申与强调?个中奥秘,值得深思。

其实,理想状态尚未到来,教育问题、科学问题、政府效能问题、信任危机……这一切弊端对我们而言都不陌生,只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或是无力改正。对此,孙月沐的所有评论似乎并不表达忧伤,甚至连忧虑都很内敛。也许,作者觉得自己做的,不是挑战,而是保证不梦游,保证所说的话不是语焉不清的喃喃自语。另外,他也深知问题的关键不是批评而是建设,在不少评论文章里,他用得最多的词,是“不应”、“必须”、“需要”、“理应”、“应当”、“恐怕”,切切之心,无遮无拦。

虽然现实加剧了作者的焦虑,但本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和题解,除了质疑与批评外,还都包含着乐观的暗示:“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这既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我眼里的百姓民生》带给人们的启发和警示。

《《我眼里的百姓民生》,孙月沐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就是看不晓得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也不晓得该看什么地方。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必须四处游历,我因此培养了一种观察城市的习惯:搭乘地铁或电车到终点站,或是深入城市中心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角落,细细观察面前的处所。这种地方总是令人深惑着迷,忙碌拥挤、凌乱丑陋、环境恶劣,种种规划皆是临时拼凑而成,充满了新进口与各种庞大的事项。我走访这些城市边缘地带的旅程不一定都是自主的选择;我曾因新闻事件而必须前往孟买北端、德黑兰尘土弥漫的边缘、圣保罗与墨西哥城市的山坡地,还有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里潜伏着许多不满情绪的各种社区。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原本生长于乡村的人口,心思与志向都执著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并且身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当中,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的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足之地。

我发现这种来自乡间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尽管表象各自不同,但基本功能与人际关系的网络却都具有相同的独特性而且易于辨认。此外,不论是在发展中世界的贫穷地区还是西方富庶的大城市里,这些城市的制度、习俗、冲突与挫折都有一套标准的形态。我们必须对这些地区投注远比目前更多的注意,因为这些地区不但潜藏着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也是贫穷人口迁入富庶生活的过渡地区。明日的中产阶级诞生于此,下一代的梦想、社会



魂交响乐较完整的乐谱。88个故事分为12个“乐章”,有些呈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共有的旋律和普同结构,譬如对死者的矛盾心情、心理学鬼与人类学鬼、地狱与审判等;有些则呈现出中国人独有的变奏与和声,譬如魂魄观念与僵尸制造、女鬼与未嫁亡女冥婚习俗的关系等;更多乐章则兼而有之,譬如轮回转世信仰遇到儒家的现世哲学产生的冲突、儒释道在黄泉路上的爱恨情仇等。

天机的窥探

明清笔记小说里,除了关于灵魂观的各种怪力乱神的故事,还有一大堆关于八字、紫微斗数、体相、风水、占星、姓名学、测字、扶乩、卜筮的故事,笔者将它们统称为命运奇谈。今日读来,却仍让人感觉相当熟悉,我

想。否则,或者会出现万马齐喑,大家都闭上嘴“不表达”;或者会出现祥林嫂那样啰里啰唆说话没人去听的“伪表达”。不管哪一种,都是与“听取表达”背道而驰的。本是常识,却又为何需要加以重申与强调?个中奥秘,值得深思。

其实,理想状态尚未到来,教育问题、科学问题、政府效能问题、信任危机……这一切弊端对我们而言都不陌生,只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或是无力改正。对此,孙月沐的所有评论似乎并不表达忧伤,甚至连忧虑都很内敛。也许,作者觉得自己做的,不是挑战,而是保证不梦游,保证所说的话不是语焉不清的喃喃自语。另外,他也深知问题的关键不是批评而是建设,在不少评论文章里,他用得最多的词,是“不应”、“必须”、“需要”、“理应”、“应当”、“恐怕”,切切之心,无遮无拦。

虽然现实加剧了作者的焦虑,但本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和题解,除了质疑与批评外,还都包含着乐观的暗示:“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这既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我眼里的百姓民生》带给人们的启发和警示。

《《我眼里的百姓民生》,孙月沐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运动与政府也都在此打造而成。在当前这个时代,随着外国援助的效果与基本面的遭到怀疑,我认为这些过渡性的城市空间将会带来我们所需的解答。政府与机构若希望认真而持续的投资能够产生长久而不易锈蚀的效益,最有希望的就是在这里,而不是宏观的国家或微观的家庭层面。

为写这本书,我走访了约20个这类地区,以便为世界各地的城市与乡村所发生的转变找出典型范例。本书无意——列出人口迁徙的目的地,也不是人口大迁徙的全球指南。在利马、拉格斯、开罗、喀拉蚩、加尔各答、雅加达、北京、马拉喀什、马尼拉等地,都可见到同样引人入胜的发展。此外,这也不是一部史无前例的著作。移民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都记录过本书中所描述的现象,而且许多学者也都慨然为我提供过协助。不过许多城市居民和领袖都没有意识到这项发展所带来的宏观冲突:人类的大迁徙正体现于一种新兴的都会区域里。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即所谓的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的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哪条路,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注意到这样的发展,以及是否愿意采取应有的行动。

《《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加拿大]道格·桑德斯著,陈信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们甚至还可在身边找到它们的“现代版本”。因为这些故事诉说的乃是中国人的命运观和中国文化里的天机窥探术,它们源远流长,历久而弥新。

当人们在思考“为什么”时,基于思维的某些特性,总是倾向于以“命运论”为前提——也就是认为“世间无偶然,凡事必有因”,大至宇宙的形成、国家的兴亡,小至个人的贵贱穷达、祸福成败、花木的荣枯等,都有一些先行因素在冥冥中决定了它们的演变。如何指名、分析并进而操控这些因素,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主要内涵。命运论有很多种,笔者将过去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称为“中国古典命运论”,而明清笔记小说里的这些相关故事,则是中国古典命运论的历史与文学显影。

如果把中国古典命运论视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巨树,那么相关故事就好比它所开的满树奇花和所结的盈枝异果。本书列举了132个故事,这些故事生动地呈现了中国民间百姓丰富而活泼的想象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的丰富和活泼却也是“命运”的,因为比它们更古老的中国古典命运论里的基本观念、当时的社会条件及人们的心理需求等,已在冥冥中决定了它们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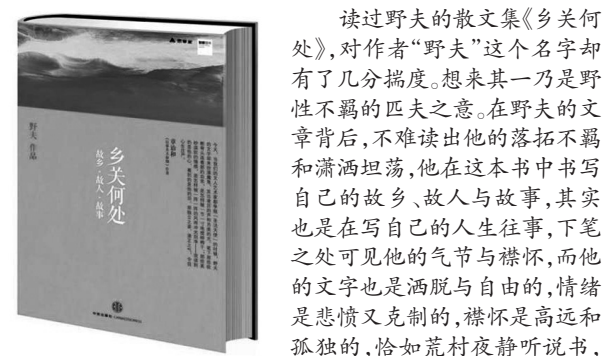
而比较中国古典命运论和西方古典命运论及当代科学决定论之异同,读者不难看出,中国古典命运论其实是人类普同的思维模式和中国文化“交感”的产物,它们所要诉说的是“心理因果律”与“文化的真理”,而非“自然因果律”与“科学的真理”。心理与文化才是最大的关注,同时也是更有趣的议题。

《《中国人的命理玄机》《中国文化里的魂魄密码》,王溢嘉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 新书品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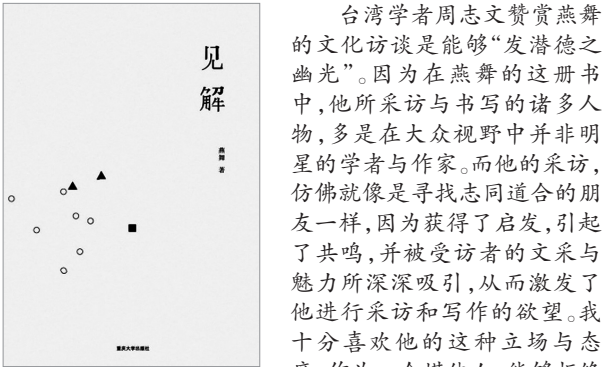
主持：朱航满

《乡关何处:故乡·故人·故事》,野夫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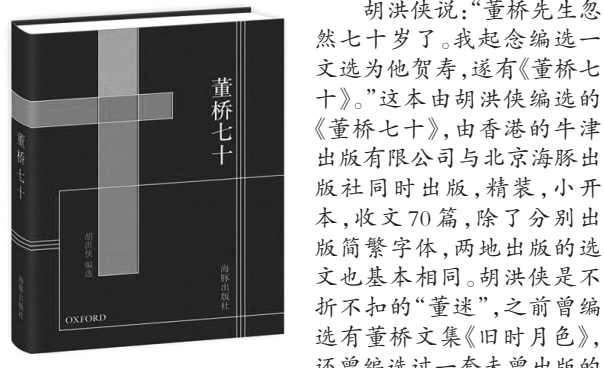
好的文章背后站着一个人,读野夫之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二乃是有野心的匹夫之意。这本《乡关何处》,野夫写自己故乡的人与事,有关于母亲、外祖母、大伯、么叔等亲人的传奇故事,也有好友、难友与志同道合者的人生记述,这些向来不被大历史的宏大叙事所顾及的个体生命,却同样折射出这个国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而野夫的野心正在于此,他试图用这些“失意者”、“苦难者”、“受害者”、“守望者”,还有他笔下的“瞎子”、“畸人”、“幽人”、“烈士”等,来重新书写那段历史。

《见解》,燕舞著,重庆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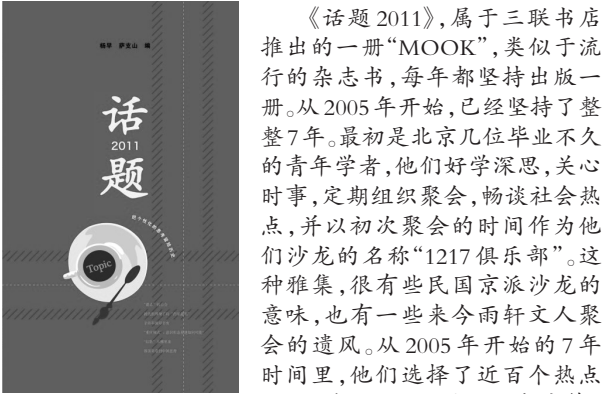
迎合大众化的媚俗,也从未制造所谓的社会热点,更不会去追逐那些脸谱化的文化明星,而是选择他自己真正认为有价值的问题,然后耐心地去阅读,去倾听,去交流,去探讨,去追问,去思考。诸如采访李辉,是因为读了他的散文集《封面中国》;采访洪子诚,是因为读了他的散文集《我的阅读史》;采访吴思,是因为读了他的著作《潜规则》;采访雷颐也是因为刚刚读过了他的随笔集《历史的进退》;甚至采访先锋艺术家蔡国强,竟是因为读了别人写了蔡国强的两本书。朱天文在序言中形容周志文《同学少年》中所写到的人物,犹如“空山松子落,不是一颗,而是数也数不清的松子从树上落下,有的落在石头上,有的落在草叶上,有的落在溪涧中,但从没有人会看到,也没有人会听到,因为那是一座空山。啊,多么豪奢的一场坠落”。此番意境,我觉得用来比喻燕舞所做的访谈,也是恰切的。

《董桥七十》,胡洪侠编选,海豚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胡洪侠说:“董桥先生忽然七十岁了。我起念编选一文选为他贺寿,遂有《董桥七十》。”这本由胡洪侠编选的《董桥七十》,由香港的牛津出版有限公司与北京海豚出版社同时出版,精装,小开本,收文70篇,除了分别出版简繁体,两地出版的选文也基本相同。胡洪侠是不折不扣的“董迷”,之前曾编选有董桥文集《旧时月色》,还曾编选过一套未曾出版的《董桥文类编》,这次编选是从董桥迄今出版的33种初版文集集中的1800篇文章中,选读了其中的70篇文章,作为庆贺。董桥的文章几乎篇篇皆佳,从这么多文章中选出一本书来,实在是困难,后来终于拟定以董桥“写父执、写师友、写同辈的文字”作为编选的宗旨,因为“他传往往是自传”。这本书还收有董桥专门为此书所作的长序《七市长笺》,并收录了他近30种初版书籍的书影,同时还录有学者余英时专门为董桥这册书所作的书法题词。余英时的诗词共7首,既写董桥文采,又录董桥性情,还写董桥精神,我觉得其中第5首最为精到,评价董桥作文为人乃是知人之论:“东篱采菊见南山,人道渊明镇日闲。读到刑天舞干戚,始知猛志在胸间。”

《话题2011》,杨早、萨支山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月出版



《话题2011》,属于三联书店推出的一册“MOOK”,类似于流行的杂志书,每年都坚持出版一册。从2005年开始,已经坚持了整整7年。最初是北京几所毕业不久的青年学者,他们好学深思,关心时事,定期组织聚会,畅谈社会热点,并以初次聚会的时间作为他们沙龙的名称“1217俱乐部”。这种雅集,很有些民国京派沙龙的意味,也有一些来今雨轩文人聚会的遗风。从2005年开轩的7年时间里,他们选择了近百个话题,进行了近百次的思想交锋,也完成了近百篇见识与文笔俱佳的精彩解读。难得的是他们看待问题的态度,冷静又不失关怀,温柔又不失深邃,独立又不失优雅。在这本《话题2011》中,谈到的话题有影响甚大的“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民国教材热”、“故宫门”、“辛亥年纪念”、“郭美美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曾曾经牵动国人,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也曾众声喧哗,但在这本《话题》中,这些论者能够以尽量冷静和全面的态度来进行重新审视,颇有些尘埃落定后的重新挖掘的意味,诸如施爱东对于“钱云会案”的论述,便是从表象之中看到“谣言”的流传,以及弱者对于自身权利的非正常途径的争夺,由此显示了论者犀利的眼光与深邃的思考,还有充满怀疑与忧患的情怀。